

丈夫酒后去世 妻子开“反劝酒联盟”

三棵已碗口粗的杨树,均已落光了最后一片叶子。12月17日中午,冬日暖阳洒在济南黄河北大桥镇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小院内。“这是爸爸栽的树。”邵丽正逗她5岁的儿子,“如果他还在,该多好……”看着活泼好动的儿子在树下嬉笑着,邵丽的眼泪又落下来。2007年12月14日,邵丽的丈夫被朋友叫去喝酒,一醉不醒。那时候,他们的儿子还不到1岁。“这几年,俺娘俩艰难度日,3年前我开了一家网店,能勉强糊口。几年来,我对酗酒身亡的事件特别关注,发现几乎每个月都有酒后身亡的悲剧发生。”2011年12月14日,在丈夫去世4周年的纪念日子里,邵丽在互联网上开通了“反劝酒”联盟。记者求证获悉,这是国内第一个“反劝酒”公益博客,短短几天内,已有全国各地网友加入。

伤痕难逝: 4年前的悲剧犹在眼前

邵丽和丈夫,老家都是山东菏泽曹县的,十几年前便来济南租住房屋做小生意营生。谈及4年前丈夫酒后身亡的事儿,邵丽仍难控制自己的情绪。“那天晚上10点多,酒店老板开车把我对象送回来了。他另外两个朋友还在那儿喝。一进门,我就觉得他喝多了,脸色苍白,他一句话也没说,指了指床。我赶紧让他躺下,并给他倒了杯水。”“之后,我就照顾孩子睡觉。顶多几十分钟的空,一开始他还打呼噜,可后来没动静了。我想,他这一口气怎么憋得这么长,怕他憋着,我赶紧喊他,可他没动静,我

拍着他的脸喊,还没动静。我害怕了,赶紧叫来住在隔壁屋里的老爷子,老爷子过来一看,也慌了。”“我赶紧到附近卫生室,叫来医生,用听诊器一听,说已没有心跳了,可我摸着他的手还是热乎乎的啊。赶紧拨打120,一边给他人工呼吸,一边等待急救车。”然而,送到医院抢救了50多分钟后,医院医生宣布,患者因抢救无效临床死亡。当时的病历,邵丽还保存着,上面写有“于20分钟前,患者饮白酒后(具体量不详),由家人发现意识丧失,呼之不应,呼吸停止……”“我丈夫是被朋友叫去陪酒的事情发生后,当晚一起喝酒的那些人没有一个照面的,这几年来,他们也与我断了交往。”邵丽告诉记者,“这几年来,我多

次咨询过律师,想把当晚劝我丈夫喝酒的那些人告上法庭,但是证据不足啊。”

反劝酒风: 她想发出自己的“微声音”

因开网店的缘故,邵丽经常上网,并通过网络关注酒后发生的悲剧。从全国范围来看,几乎每个月都有酒后身亡的。她把媒体报道的酒后悲剧事件都留存下来。仅在济南,2007年12月17日,在历下区姚家庄,一男子应邀赴宴喝醉后再也没有醒来,留下悲痛欲绝的孤儿寡母;2009年1月18日,刚订婚不久的刘某来济南拜望岳父母,当晚4人喝了6瓶白酒,刘某醉酒后身亡;2009年5月29日,济南徐先生与5名朋友喝了29瓶啤酒3瓶半白酒,昏迷后身亡……“喝酒的危害人尽皆知,可大家依然在酒桌上劝酒、逼酒……酒已成了一种交际工具,喝酒好像变成忠诚度和友情深浅的一种考验,很多人为此付出了不必要的代价。邵丽感慨,不会喝酒,不会劝酒,在社会上就混不下去了?”成立一个“反劝酒联盟”的想法,早已在邵丽的脑海中存在了很长时间,但她一直感觉,仅凭自己一人的呼吁,声音太微弱了。微博逐渐兴起且影响力越来越

越大,邵丽突然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了落脚点,“开微博,算是发出自己的‘微弱’声音吧”。12月17日,记者登录她开设的“反劝酒联盟”发现,全国各地已有40多人予以关注,他们均痛陈劝酒、逼酒带来的危害。已加入“反劝酒联盟”的汤先生称:“我认为劝酒逼酒风在长江以北地区尤为严重,北方受儒家中庸之道的影响要比南方重,公开场合习惯了满口仁义道德,羞于言利,只有借着酒劲装醉,才能表露出自己的利益诉求,在酒的浸染下,利益各方会实现很多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共识。”

酒风异化: 扭转“劝酒风”很艰难

劝酒逼酒风害了谁?据河北2010年一项普通人群饮酒情况调查,在饮酒人群中,工商业者占61%,饮酒的高峰年龄在26至45岁,工商业经营者饮酒率最高,达72%,其中53%是重度饮酒者。北京天坛医院针对90例因喝酒导致肝硬化病人进行的一项统计显示,年龄最大的75岁,最小的29岁,平均年龄约38岁。这些人的职业主要是公务员以及工商业者。接受采访时,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感慨,喝酒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,而敬酒最早是一种敬

老仪式。但现在,敬酒的内涵不断被异化。在社交场合,敬酒成了一种交际手段,用来招待上级、贵宾或为了达成谈判目的。有时敬酒不是为了对方健康,也不是让对方喝好,而是为了故意把对方灌醉,似乎只有这样事情才能办好。他表示,劝酒、灌酒还会严重影响社会风气。劝酒,特别是强迫别人喝酒是一种不文明行为;喝酒、划拳、喧嚷影响周围就餐的人;酒喝多了导致酒后失态,有时还会误事,有些人甚至耍酒疯、拳脚相向,不仅起不到拉近关系的作用,反而会损害人际关系。既然大家都明白喝酒伤身,也并非真想喝,为什么还会陷入劝酒、敬酒这个死循环?山东大学社会学学者高洋称,长期以来形成的劝酒文化具有强大惯性,喝酒已经不是简单的事,里面被注入了太多的含义,想扭转“劝酒风”并非易事。“但我对开设‘反劝酒联盟’公益微博的做法表示支持。”对此,邵丽深有感触:“即便想影响身边的人不要去劝酒逼酒都很难,明明知道喝多了不舒服,他们还是无奈地去喝酒,去劝酒,自己既是受害者,又是施害者。”但毕竟,“反劝酒联盟”微博已经迈出了第一步,邵丽说,哪怕自己的声音很微弱,也要为此去呼吁。据《济南时报》

中学生写家族史感知时代脉搏

■自本世纪初兴起的公民写史的热潮已经蔓延到中学。有些学生已不再满足于死记硬背历史,而是通过研究和书写自己家族的历史,来感知时代的脉搏。■正是因为写家族史,温佳熠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“我想知道前辈的命运,就得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”。■“评判一个人物,绝对不能简单地只用‘好’和‘坏’两个极端的字眼去评判,而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用辩证的眼光去看。”热爱历史的雷宗兴一直对自己的家族史充满好奇。

生活的巨大影响;假如没有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,则不可能有我父亲和伯父今天的成功……”在温佳熠的书包里,背着几本厚厚的《历史》教材,里面宏大浩瀚地记载着王侯将相和国家兴衰。而他所自豪的,是几页自己书写的《历史洪流中成长的家族》。自本世纪初兴起的公民写史的热潮已经蔓延到中学。有些学生已不再满足于死记硬背历史,而是通过研究和书写自己家族的历史,来感知时代的脉搏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,“我感觉我们的历史绝大多数都是记录帝王将相,或者特别坏的事件,没有记录日常生活的历史。我觉得日常生活、老百姓的历史最重要”,他认为“判断一个历史事件、一个运动,不要看它的宣言、文件,要看老百姓的生活怎么样”。

“我想知道前辈的命运,就得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”

如果以前让温佳熠背背1898年前后的那段历史,他需要挠挠头仔细想想。但现在让他讲,他会滔滔不绝地给你讲当时列强正在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,山东的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,康有为、梁启超进行戊戌变法……因为那一年,他太爷爷出生在山东半岛的一个小山村。温佳熠是山东师范大学附中一名高二学生。父亲夸他为家族做了一个大贡献,因为其父亲和叔伯们一直在商量,想写自己的家族史,没想到被16岁的儿子完成了。一直以来温佳熠都觉得历史距离自己很远,“没想到它和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联系竟如此密切”。一切历史放入先辈们生活的背景之下,便变得有意义起来。温佳熠的太爷爷是个教书匠,人生经历并没有太多曲折。曾祖父闯关东,并且在大连从一个小伙计干起,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创

立了自己的商行,成了掌柜。商铺的名字叫“公顺福”,最鼎盛时期,半条街都是温家铺子。而温佳熠的爷爷1933年出生,11岁被接到大连上学,“那时日本已经占领东三省,学校里也开设日语课程。我爷爷也被迫学了日语,到现在他还记得几句。”78岁的爷爷还给温佳熠讲了一个故事。1979年,爷爷奶奶到大连探亲,买了一个小方桌背回来,在拥挤的船舱中,小方桌的确是个不小的负担,“我和你奶奶为什么背回这个小方桌?就是为了方便你爸爸他们学习啊。”结果,他们家连出三个大学生。这个小方桌至今还在,已经成为温家一个重要的历史实物。正是因为写家族史,温佳熠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“我想知道前辈的命运,就得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。”

爸爸妈妈都不敢相信

“90后”的中学生写家族史,这在很多成年人眼里是不可能完成的工程。“刚开始我都没告诉爸爸妈妈,他们从我们学校的网站上看到我的文章获奖了才知道,他们都不敢相信。”温佳熠的同班同学王者贤告诉记者。王者贤写的主人公是自己的外曾祖父艾鲁川,生前系山东省工商业联合会主席,曾任公私合营济南裕兴化工厂经理。艾鲁川的命运转折点基本上都和历史拐点有直接联系。1914年,艾鲁川诞生的那一年,有太多的大事发生: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,袁世凯破坏辛亥革命果实。14岁那年,艾鲁川离开泰安汶口,到济南做生意。17岁进入当时的裕兴颜料股份有限公司(现在的裕兴化工厂),苦干了17年,从学徒一直升至总经理。裕兴化工厂遭遇过两次浩劫:1937年底济南沦陷后日寇铁蹄无情践踏与勒索,甚至遭到强拆,二度濒临破产,正如艾鲁川在回忆录中所云:“在旧中国,实业救国只能是一枕黄粱……”

济南解放后,裕兴化工厂在艾鲁川的带领下修缮厂房,整理生产设备,成为济南市工商业界最早恢复生产的一家。1954年,响应政府号召,艾鲁川主动提出公私合营。1956年,艾鲁川代表山东省和济南市工商业者,参加了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,“有一天晚上,毛主席招待了与会人员,其中就有我曾祖父,回家后就对家人说,‘我这右手是毛主席亲自握过的,你们快来和我握手吧。’”王者贤说。“好人”和“坏人”郭庆萍万万没有想到,在她及家人心目中一直是“坏蛋”的爷爷郭葆琳,竟然被上高二的外孙雷宗兴挖掘出尘封一甲子的历史证据,完全颠覆了她的认知:爷爷是近代科学功臣,不是反动派。郭庆萍关于爷爷的记忆,对外人是难以启齿的。她知道爷爷郭葆琳是国民党的一名官员,是被游击队打死的,文革时期因出身问题家庭遭受众多磨难。所以,当16岁的外孙雷宗兴也要写家族史的时候,她直摇头。

“评判一个人物,绝对不能简单地只用‘好’和‘坏’两个极端的字眼去评判,而应该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用辩证的眼光去看。”热爱历史的雷宗兴一直对自己的家族史充满了好奇。雷宗兴也是山东师范大学附中高二的学生,从姥姥的嘴里,得知她小时候家里住洋房,穿毛料衣服,家里还有司机,但是姥姥对自己的爷爷郭葆琳却耻于提及,甚至划清界限,称他是“坏人”。以前的照片、族谱等资料全在文革期间抄家时被烧了,雷宗兴通过一台电脑、一根网线,加上姥姥的点滴回忆及陈年旧事,让搜到的郭葆琳的轮廓越来越清晰:山东夏津人,留洋日本,县知事,山东农业大学校长,青岛市委书记,伪宪法起草委员……接着他又搜到了郭葆琳写的《中国养蚕学》《山东农业概括》《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书》等著

作,仅仅学术著作就有10多本,而且至今有售。“郭葆琳不是坏蛋,而且是个农学家。”这样的转折让郭庆萍默念“愧对祖宗”。她将这一消息在第一时间告知了全国各地的郭家人。“以后就是你们的历史啦”“仅仅靠大量灌输,是很难让学生真正地融入历史的。”山师附中的历史教师王醒告诉记者,“让他们写历史,让他们知道,历史不是和他们没有关系,而是关系密切,和他们家族、个人都相互交汇、融合。”在山师附中的历史课上,鼓励同学讲历史、展开讨论已成为常态,“有时候他们讲的内容连我都不知道。”王醒觉得“90后”学生拥有着敏锐多元的触角,思维非常活跃。雷宗兴非常喜欢媒体宣传他时用“90后”来称呼他,因为他想为“90后”正名。“‘80后’刚开始诞生的时候,因为大多是独生子女,被称为小皇帝,垮掉的一代,自私的一代。而现在通过汶川地震等,‘80后’所展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基本上被正名了,他们已经渐渐被社会认可。现在,这种偏颇的目光又转嫁到我们这些‘90后’身上,又给我们贴上了非主流、脑残的标签。”雷宗兴对此很不满。“无论评价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,都应该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,才能客观、公正。”雷宗兴举例说,“曹操向来都是唱白脸的,说他狡诈阴险,现在不一样了。还有李鸿章,过去都说他是卖国贼,老师曾经给我们放过一段视频:当时签订赔偿条约时,李鸿章和对方讨价还价,最后说,‘你们总得给我留一点回家的路费吧。’并不是他想卖国,而是国家衰败,他生不逢时。”“你们是最幸福的一代啦,以后就是你们的历史啦。”温佳熠的爷爷讲完自己的家族史后,端着茶杯喝着茶,慈祥地看着孙子……据《齐鲁晚报》



温佳熠祖父的照片 (受访者提供)

“我发现我的家族100多年来的成长史与我们国家的历史保持着密切的联系:太爷爷出生的1898年,列强正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;太爷爷‘闯关东’的经历,则是那个动荡的年代千千万万山东人谋求生存的一个缩影;至于爷爷从生产队长到销售科长的角色转变,则反映了改革开放政策对农村